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思想探源

张琳琳

淮阴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淮安市，223003；

摘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科学构想。毛泽东是总体布局思想的首倡者，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思想源头。毛泽东用整体性、宏观性、历史性、战略性的分析方法，观大势，谋新局，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初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制度和物质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DOI：10.69979/3029-2700.24.5.039

“五位一体”总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的宏伟蓝图的着力点。学者普遍认为总体布局思想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前途命运”。

“五位一体”总布局思想的理论源头究竟在哪里？关于该问题，学界认识不统一，存在忽视毛泽东在总体布局思想形成中的地位的全面认识，仅以毛泽东相关著作中没有出现过“五位一体”或者“总体布局”等词语，就断定毛泽东没有关于总体布局的思想，这显然会割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中的贡献，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会给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留下可趁之机。科学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要从显而易见的结论出发，应该从思想内涵出发，而不能仅从个别词句出发，应当坚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 关于全局与战略的正确认识，是毛泽东总体布局思想的逻辑起点

《辞海》解释“布局”与“部署”、“布置”同义，都有安排的意思，但较之二者，“布局”着重于“局”，强调从全局观点规划安排。总体布局首先要清楚“全局”，才可能有正确地战略部署。毛泽东虽然没有关于总体布局的直接论述，但并不妨碍他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总体布局”这一思维方式或工作方法。

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论述了全局与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只有从战争总体或全局出发，才能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毛泽东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國革命战争的特点“政治经济不平衡半殖民地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1]，认为“这些特

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2]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全局。他指出“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据此，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科学判断敌我力量的对比，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与此相关的战略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以棋类用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强调统筹全局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4]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强调，领导者重要的领导艺术是统筹全局的能力。他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这是一种领导艺术。”^[5]领导人员应该克服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不断提升统筹全局的能力。1949年3月，他又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运用形象的比喻要求“党委的同志必须学会弹钢琴”，将统筹兼顾明确为领导方法原则。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通篇强调统筹兼顾的重要性。毛泽东的全局观、战略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揭示了全局特点发生变化，战略布局也应随着调整的基本规律。

2 谋大势，确定全局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者，强调用“全面的

历史的方法”分析问题，他始终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思考中国问题。“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服从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总体认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认清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6]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7]。从宏观上指明了社会主义才是革命发展的最终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拒绝第三条道路，否定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宣称“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8]，美国要援助世界各国免遭共产主义统治。在欧洲，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从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在亚洲，积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并且不断放松对日本的军事管制。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苏联也采取了相应的对抗措施，形成了两极对垒的国际格局。毛泽东冷静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渴望和平的民主力量在增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增多，从总体来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9]。基于国际发展走势的正确判断，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10]这句话表明了一边倒即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艰苦探索的正确选择。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新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国际支持。而美国在“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措施干扰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毛泽东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命运，他强调新中国建立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遭到了来自国际国内的严峻挑战，毛泽东仍然毫不动摇地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这不仅引起了苏联国内的震动，

国际社会也为之哗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当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受到影响。中共中央1956年3月17日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篓子。所谓揭了盖子，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模式不是完美的，各国党应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要迷信。所谓捅了篓子，是指各国党还没有思想准备，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担忧。面对种种疑惑和误解，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强调“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出路。”^[12]

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从整体性、宏观性、历史性、战略性的角度做出的价值判断，是毛泽东总体布局思想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在宏观把握、科学判断世情、国情和党情基础上做出的价值选择，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做出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大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红旗变色”的质疑时，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重要问题”^[13]，“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4]江泽民在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泛滥时，也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观。胡锦涛在面对“和平演变”时，一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5]。习近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又再次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6]，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如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指向。

3 布新局，初步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毛泽东“总体布局”思想的不断完善和深化是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目标展开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主要是指经济落后的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社会的全面变革，

以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毛泽东所理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上的现代化,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的现代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奋斗目标规定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多年奋斗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7]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部封锁和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以及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教训和不发展就要被开除“球籍”的现实紧迫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开创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为核心的“四个现代化”布局,确立与之相配套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部署的思想。

3.1 在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部署“四个现代化”布局

“在建国初,随着军事任务的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即已开始”^[18]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夺取政权并不是最终目的,革命的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应依靠人民政权的力量,“剥夺剥夺者”,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19]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绘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20],后来又表述为“三年准备,十年发展”^[21],并被中央确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由新中国成立初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到1960年毛泽东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再到1964年正式确定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已经逐步走出苏联模式的影响,不是单纯的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而是全面的社会现代化,“四个全面现代化”为社会全面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起点,“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条件”^[22]。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的确定和三大改造完成后确定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低速发展的条件下,计划经济

与工业优先发展达到完美的耦合。”^[23]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拓,使我国建立起符合大国国情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既可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也可以增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还可以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和封锁。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创者,这条道路,不同于其他后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他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同时,要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工业化的重点,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绝不能忽略生活资料的生产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专门谈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认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如何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从理论上实现了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向“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转变,不仅对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的调整提供了现实经验和理论参考。

3.2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现代化服务

“四个现代化”属于社会经济领域,只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毛泽东是历史唯物论者,他承认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同时强调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24]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基本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1957年10月毛泽东初步部署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建设的目标——集中与民主、自由与纪律、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辩证统一的政治局面。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巴黎公社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为借鉴,以国情、民情、党情和世情为依据,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并通过撤销“乡保甲制”推行“区乡制”再到撤销乡一级行政组织让位于高级社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不断扩大基层社区自主权,提升了村民民

主意识,保障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创建基层群众自治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25]。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结束了几千年来旧的阶级关系的束缚,将人民群众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有不成熟不完善的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干部中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在一些农村、工厂和学校出现了“闹事”的情况。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严重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尤其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本方法即民主和专政的方法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等等。毛泽东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政治生活的主题,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26]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3.3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

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文化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7],说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8],并规划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目,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

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9],确定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化建设中,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提供人力资源。美国学者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能动因素。毛泽东深谙其中的道理,他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认为只要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条件下,可以克服人间的任何困难。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毛泽东主张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改革文字,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提出了“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培养目标。所谓“红”即“革命化”,“专”指“专业化”。为了凝心聚力,尽快摆脱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形成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观点:在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培养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在思想建设方面教育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养成艰苦奋斗精神,要求党员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还对党员干部队伍提出学习科学知识的要求,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并根据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科学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4 结语

总体布局思想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具体化。毛泽东是总体布局思想的奠基者,他从“一穷二白”、内外交困的基本国情出发,谋篇布局,确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根本方向;绘制“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制度轮廓;规划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对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得益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系统集成、相得益彰,打通了改革淤点堵点、增强了改革整体效能。就此而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指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91.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91.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73.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21.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01.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33.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50.
- [8] 刘金质. 冷战史: 上[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17.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67.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2.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7.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67.
-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8.
-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8.
- [15] 中央文献出版社.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25.
- [16] 新华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4-09-30) [2024-10-31].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4-09/30/c_1130206946.htm.
- [1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18] 龚育之. 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8.
- [1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61.
- [20]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75.
- [21]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2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367.
- [22]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6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22.
- [23] 郭根山. 世纪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0.
- [2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51.
- [25] 杨春风, 金民卿.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贡献[J]. 理论探索, 2011(5).
- [26]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16.
- [2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2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5.
- [2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50.
- 作者简介: 1. 张琳琳 (1980——) 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明的演进道路与内在机制研究” [22&ZD015];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构建研究” [24YJA710070]; 淮阴工学院课题“‘数字+文化’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Z421A24271]; 2018 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课题“应用型本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研究” [2018SJSZ718]
-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B/2023/01/126);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基于数字化语境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2023SJSZ1105) 淮阴工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大课题“共谋·共建·共享: 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研究” (H GJG2023012)。